

是可以无限供应的。

《新民周刊》：最后一章写到了国家体制中的佛教，我们知道，明朝的很多皇帝都笃信道教，那么国家体制中的道教是怎么样子的状况？佛教和道教之间是不是也常有矛盾存在？

卜正民：宗教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太复杂，几句话很难说清楚。所谓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竞争往往大多是宫廷的赞助比赛，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意义不大。中国历史的问题不是一个皇帝信仰道教还是佛教，而是这种信仰如何影响到皇帝统治他的官僚机构的能力。我们可以说，在大部分的统治时，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是最接近天堂的人；因此，他们也认为他可以利用佛教、道教的技术延长他的王朝的寿命，成为他的子民的保护者。一些宗教界人士确实使皇帝将资金运用到宗教事务上来，从而减少了国家其它方面的开支，但这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也没有太多证据表明过度的宗教信仰会改变国家政策。

《新民周刊》：1567年，明穆宗取消了海禁政策，孔飞力因此把这一年视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您是否同意孔飞力的观点？明朝的海禁政策是否远没有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么严格，民间走私海运一直存在？那么，在您《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一书的主角塞尔登生活的年代，明朝在世界海运中又占据了一个怎样的位置？

卜正民：我相信孔飞力教授是在读到我的《纵乐的困惑》一书后才注意到1567年的重要性的，所以，是的，我同意这个观点。认为1567



右图：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

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也许是错误的，但这正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可持续联系的关键所在。这种观点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中国历史观，还对欧洲历史观提出了挑战。许多西方历史学家仍然认为现代性是逐渐传到世界各地去的。我将现代性视作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欧洲只不过是依靠其与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中国——的贸易而改变了现代性的方向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放宽海事禁令至少具有象征意义。

面向普通读者讲故事

《新民周刊》：怎么会主编《哈佛中国史》的，这套《哈佛中国史》更多是针对普通读者的通史吗？您会采撷一般不为人所关注的怪力乱神的内容，纳入自己撰写的《哈佛

中国史·元明卷》，这是为了勾起读者的兴趣？

卜正民：编一套《哈佛中国史》的想法来自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长期的工作交流。原来的计划是四卷，但在开始编写时改为五卷，最终定为六卷。我的目标是编一套基于最新研究的中国史，但在写作方式上，我们希望一个大学学生或者对历史有兴趣的普通读者都可以理解和阅读。不像《剑桥中国史》，它的目标读者是研究生，而《哈佛中国史》的目标读者是本科生。中国读者应该知晓，他们不是我们的目标读者。中国读者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有所了解；我希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可以从我们的这套书学到点什么。因此，我们写了许多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故事，那是为没有任何中国背景的读者所准备的。

《新民周刊》：每一卷的分卷

明朝在1644年的灭亡有很多原因，只有部分原因是气候威胁到了基本的生存。